

中国
文化
与
闽
台
社会

汪毅夫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 与闽台社会

汪毅夫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

汪毅夫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印刷厂排版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 插页 225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34—976—2

I·871 定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一）

孙绍振

第一次见到汪毅夫印象很深，那还是在文革浩劫期间。精神的贫困，并没有妨碍一批知识青年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文艺，虽然那时谁也逃不脱那僵化的模式，但是我们仍然在驾驭文字的竞赛和游戏中，得到某种胜利的欢乐，从而增强了生活的勇气。我那集体宿舍的房间中，时常有一批文学青年来聚会，那时毅夫还没有进入福建师大中文系，在素昧生平的一伙年轻人中间，他比较沉稳，油瓶底似的近视眼镜和青春的风采显得颇不相称，但是他那略带五角形的脸庞，使我感到亲切。后来他告诉我，别人对他说他的脸型和我的很相像，我也有同感。但这似乎并不是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原因。使我对他产生某种惊异之感的是一个同来的年轻人告诉我，他并不立志献身于文学创作，而是热衷于学术考证的一个怪才。

这才真正使我大吃一惊。在我印象中，献身于考证的都是一些皓首穷经的老学究。对于那些为了乌龟壳上的文字、骨头早已化作泥土的作家的出生年月，或者宋朝版本的真伪，而不惜牺牲毕生年华的老教授，我向来非常尊敬又深感不解，而眼前又是一个考试交白卷可以成为当代英雄的时代，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居然选择这样一个冷门，作为自己的生命之路，我不免多朝他看了几眼。很快我知道了，他还有个外号，叫做“老夫子”。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雅号”，不但泰然处之，

而且多少有点自得其乐的神情，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在恢复高考之后，他进入了福建师大中文系，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对他的考证功夫有了一点了解，发现他的治学精神并不完全是老学究、老夫子式的。还在学生时期，他对鲁迅生平细节的一些发现，已经使我不胜惊讶，等到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以后，我注意到他的一些论文，尤其是关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论文，其收罗第一手资料的系统和严谨，使我不得不刮目相看。更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长于占有资料，而且其理论的阐发也有相当精致之处。

当然，拿当时那些成果和今天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来比，那不过是起步而已。

从1990年以来，他平均每年都有一部学术专著出版。其选题基本上集中在闽、台文化方面。《台湾近代文学丛稿》、《台湾文化概观》、《台湾社会与文化》、《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以及眼前这本《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还有其他一些著作，都是他多年来智慧的结晶，他把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最活跃的心智都集中在闽、台文化研究上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行家的公认。可以说，他和刘登翰的著作在闽、台文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该忘记的是，当年汪毅夫开始闽、台文化研究的时候，这个课题还是个冷门。毅夫甘于寂寞，甘于在冷门中以面壁十年的精神为学术作出贡献。今天，闽、台文化研究已经由冷门逐渐变成热门了，在这由冷变热的过程中，毅夫的学术成果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虽然，闽、台文化研究已经成了热门，但是毅夫做学问的精神和方法，还是不改当年的那种冷门风格。一种学问成了热门，往往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除了观点的抄来抄去，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借用他人论文中的材料，又不老实声明是二手材料，

胡乱敷衍成篇。做热门文章、窃取热门材料，成了学界的顽症。毅夫之所以值得敬重，就在于他就是做热门文章，也坚持他一以贯之的冷门精神，不管多么热门的论题，他所用的资料大都是相当冷门的。

当我读着他那些冷辟的新材料，往往不由得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经教导过我，读纯学术的文章，判别其学术含金量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管他说什么，先看他的注解，看他有没有新材料，其次才看他有没有新观点。因为材料是观点的基础，再新的观点如果没有材料做后盾也免不了软弱。

从这一点看，毅夫的文章是经得住先师这条严格标准的检验的。我读毅夫的文章，往往有大开眼界之感，除了他论述时有警策之处外，主要就是他的材料大都是第一手的，原汁原味、好像上帝才创造出来、还冒着热气似的，其充分和丰富常常令我仔细揣摩。

有的人有一分材料能说十分话，有的人有了十分材料只说一分、二分最多三、四分话。毅夫的文风大体属于后者，他运用资料常常有避俗的倾向，直接的引用和多种材料的概括同样自由，不但可以见出他的广博、而且可以感到他的深思和敏锐。就以书中《清代福州对台文化交流的若干情况》为例。应该说，这篇文章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但是就学术资料的掌握来说，完全能表现出他的特点，除了不算罕见但也并非常见的一些文献、诗文集外，他在论文中引用的刘家谋的《观海集》、郭曾圻等人的《家慈林太夫人七秩寿辰征诗文启》、王学广等人的《哀启》等，都可列入罕见的宝贵学术资料之列。毅夫对于此等文献，不仅表现出他的兴趣，而且显示了他的特别的热情。了解毅夫的朋友完全可以从感受到他这种可贵的学术个性。

以冷门精神做文章本该是一切学术论文的根本，在当今学术

文抄公横行天下之时，毅夫这种精神应该使一些不老实的“学者”汗颜。

活到这份老是为人写序的年纪，按习惯，在序言的最后，我总要对作者的文章提出一点批评。然而，对于毅夫的书，我却没有什么把握，我怕把自己为文的追求强加于毅夫。尼采说：“最坏的读者的行为就像抢劫的军队一样，他们从作品中弄走可取的部分，然后把剩下的部分弄脏弄乱”，我不想做最坏的读者，但我相信毅夫大概应该属于尼采所说的好的作家之列的。尼采说“好的作家……喜欢被理解胜过被赞美”。

但愿我是属于理解毅夫的读者之列的一个。

1996年11月5日于福建师大

序(二)

刘登翰

在台湾文学的研究中，有一个领域、一种角度是属于汪毅夫的；或者说，在台湾文学的研究者中，恐怕没有谁比汪毅夫更适合以这种角度来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了。

正因为如此，并不常在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上露脸的汪毅夫，他的研究却受到人们记取。

我和毅夫相识于二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个爱好文学的插队知青。那时的知青作者大都写自己下乡的人生体验，毅夫却选择了当时唯一可以进行研究的鲁迅。后来，毅夫从上杭农村回到厦门，在穿街走巷的“绿衣使者”（邮递员）的匆匆步履中，留意于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的考证。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先生的肯定。1978年，接近而立之年的毅夫考取福建师大中文系，后来又成了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先生的研究生。俞元桂先生在为汪毅夫的《台湾社会与文化》一书作序时，谈到了当年中山大学研究院文化人类学部的学术风气和治学方法：“很注意实地调查，如考察民族、民俗、宗教、民间文艺之类”，对毅夫近年的研究注重实证、注重调查表示嘉许，称道其“为学精细，长于考证”。在学界越来越多大而无当的浮躁空疏之论的情况下，愿意下功夫进行精细扎实的研究，尤为可贵。

80年代后期，汪毅夫从大学调入福建社会科学院。他的研究视野也逐步从现代文学转向台湾文学、尤其是台湾近代文学的研

究。这个转变，当与他的家世背景不无关系。

汪毅夫的曾祖父汪春源是台湾历史上的最后一名进士，同台湾进士施士洁、许南英、丘逢甲等为师友之谊。1895年，当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台弃地的《马关条约》，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等人联名上书，抵制《马关条约》，表示宁可“死为义民”，不愿“生为降虏”。其后，他们又共同参加了由康有为发起的千名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运动。抗争不果，汪春源终于从台湾携眷内渡，寄籍闽南。汪毅夫钟情于台湾近代文学的研究，其对象正包括了汪春源及其师友在内的台湾近代诗人，个中当然也凝结着汪毅夫对先人、故土的情意。

汪毅夫治学严谨。他从各地图书馆、文化馆（站），从民间藏书收集资料，也多方收集各种口碑、实证，完成了《台湾近代文学丛稿》、《台湾文学史·近代文学编》和《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三种著作的写作，提供了台湾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不少新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黎湘萍博士曾指出：“他的扎实的研究，有一种不言自威的力量”，海峡彼岸的学者也有很好的评价。在台湾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汪毅夫功不可没。

在研究工作中，汪毅夫逐渐接近和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把研究的视野从文学拓展到文化，又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这典型地表现在他的广获好评的《窗口随想录》（曾连载于《台港文学选刊》）里。《台湾社会与文化》是汪毅夫在这方面的最初成果。本书《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则是他进一步把两岸文化，特别是有着共同母体渊源和承递关系的闽台文化，放在同一的文化格局中，对其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进行审察、对比和研究的新的成果。

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本侵占的五十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中华文化始终是

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汪毅夫关于“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的研究成果，无疑地还具有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方面的积极意义。

相信这部著作会引起海峡两岸学术界更大的兴趣和重视。

1996年11月28日

目 录

- 序（一） 孙绍振（1）
- 序（二） 刘登翰（1）

- 文化：闽江流域与台湾地区（1）
- 清代福州对台文化交流的若干情况（16）
- 清代班兵制与澎湖的“铜山兵”（42）
 - 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侧面

- 台湾人民与日据台湾时期的闽台关系（47）
-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与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54）
- 城郭已非华表在 斯文不坠一脉延
 - 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维护中华文化的事迹（62）
- “出头天”的理念与“弱者斗士”的形像
 - 进化论与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69）
- 略谈日据前期台湾文学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78）

- 随意随俗的走向与闽台民间信仰的共同进步（87）
- 闽台民间的广泽尊王信仰（97）
- “船仔妈”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107）
- 闽台民间的吕祖传说和吕祖信仰（121）

○闽台零祭丛谈·····	(130)
○金门：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录与民间信仰的特异情节·····	(138)
○南平樟湖集镇的民间信仰·····	(145)
○福建科举人物丛谈（三题）·····	(158)
○金门历代作家小札·····	(173)
○《天演论》思辨录·····	(189)
○东南地区的抗战文艺·····	(201)
○略谈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	(212)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	(230)
○从清代闽台社会看“五缘文化”论 ——评林其铨《五缘文化论》·····	(254)
○台湾竹枝词研究的新成果 ——读《台湾竹枝词》（刘经发）与《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翁圣峰）·····	(263)
○南中国区域社会的文化发展·····	(268)
○后记·····	(290)

文化：闽江流域与台湾地区

闽南文化同台湾文化的历史渊源，乃是闽、台关系史研究中一个人所共言和人所共识的话题。与此恰成对照，闽江流域同台湾地区在文化上的关联则迄今仍是一个未得置重的论题。

文化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传播、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具有这种文化的人的迁徙、通过区域之间人的互动实现的。

本文拟从文化人士互动的事例和事迹来描述清代闽江流域同台湾地区在文化上的关系和联系。

本文谈论的闽江流域指福建境内闽江各源流、各支流和闽江干流经过的区域，包括今之松溪、政和、浦城、建瓯、武夷山（崇安）、建阳、光泽、邵武、顺昌、建宁、泰宁、将乐、宁化、清流、连城、永安、明溪、三明、沙县、南平、大田、尤溪、古田、德化、永泰、闽清、闽侯、福州、长乐诸县、市；谈论的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等岛屿，包括台湾省境内今之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基隆各市及台北、彰化、桃园、台中、高雄、台南、屏东、嘉义、云林、新竹、苗栗、南投、宜兰、花莲、台东、澎湖诸县。

与闽南地区不同，闽江流域不曾有过大规模移民台湾的历史

记录，但在清代曾有大批文人以游宦、游幕、游学等事由从闽江流域迁徙入台，也有部分文人从台湾到闽江流域居官和求学。

从闽江流域到台湾地区或者从台湾地区到闽江流域的游宦之士略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闽江流域的文人到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文人到闽江流域担任教职^①，二是闽江流域同台湾地区的官员互调。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清代台湾各级（府学、厅学、县学）、各地、各种（教授、教谕、训导）^②教职 641 任中，有 270 任由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担任，占总数的 42%。台湾府学教授 70 任中，有林谦光（福建长乐人）、郭美（福建闽县人）、马清枢（福建侯官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26 人 27 次担任是职；台湾府学训导 51 任中，有袁宏仁（福建建阳人）、李长芳（福建永安人）、吕天茂（福建顺昌人）、范应斗（福建大田人）、刘家谋（福建侯官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22 人 23 次担任是职；淡水厅学训导 35 任中，有张梦麟（福建闽县人）、范志伸（福建松溪人）、高嘉炳（福建光泽人）、丘葆莽（福建建宁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19 人 19 次担任是职；台湾县学教谕 63 任中，有陆登选（福建瓯宁人）、郑兼才（福建德化人）、谢金奎（福建侯官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25 人 26 次担任是职；台湾县学训导 52 任中，有薛云（福建建宁人）、陈元恕（福建永安人）、李振汉（福建闽县人）、傅吕（福建邵武人）、吴镇（福建崇安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26 人 27 次担任是职；凤山县学教谕 62 任中，有朱竟成（福建永安人）、徐文炳（福建建阳人）、朱仕玠（福建建宁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21 人 21 次担任是职；凤山县学训

① 清代回避制度规定，“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但教职不在此限。

② 台湾厅学未设“学正”一职。

导 48 任中，有江冰鉴（福建侯官人）、朱 澐（福建南平人）、力梦霖（福建永福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23 人 23 次担任是职；诸罗县学教谕 31 任中，有陈志友（福建长乐人）、施松龄（福建古田人）、陈振甲（福建浦城人）、刘坦（福建建阳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16 人 16 次担任是职；诸罗县学训导 12 任中，有李嘉仕（福建建阳人）、罗学龄（福建顺昌人）、何泽可（福建光泽人）等闽江流域的文人人士 10 人 10 次担任是职；嘉义县学教谕 22 任中，有吴斯勃（福建闽县人）、杨镛（福建连城人）、林清瑞（福建永泰人）7 人 7 次担任是职；嘉义县学训导 21 任中，有何泽可（福建光泽人）、谢云龙（福建顺昌人）、丘蔚深（福建将乐人）、柳其椿（福建大田人）等闽江流域的文化人士 10 人 10 次担任是职。

杨彦杰《闽台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①谓：“据台湾方志不完全统计，在清领台湾期间，全台共有 80 名科举人物被派往福建任职，其中进士 1 名、举人 18 名、贡生 61 名”。这批人士中，有的任所乃在闽江流域。如台湾举人庄飞鹏曾任浦城县学教谕、台湾县举人张源俊曾任松溪县训导、台湾县举人李维梓曾任闽县县学教谕、彰化县举人刘大业曾任福州府学训导、彰化县举人郑捧日曾任大田县学教谕、彰化县举人曾作霖曾任闽清县学训导、淡水厅举人黄延祐曾任侯官县学教谕等。另有其他文化人士到闽江流域担任教职，如淡水县陈维英于 1845 年渡海出任闽县教谕，时陈维英尚未中为举人（陈维英是 1859 年中举的）；又如嘉义县优贡陈震曜曾任建安县学教谕、闽清县学教谕，又曾“调省，

^① 《现代台湾研究》第 7 期，1994 年。

监理鳌峰书院”^①，台湾府岁贡黄元倬曾任清流县学教谕，台湾府岁贡林萃冈曾任清流县学训导，台湾府岁贡蔡复旦曾任闽清县学训导、永安县学教谕，台湾县岁贡王弼曾任松溪县学训导，诸罗县岁贡蒲世趾曾任古田县学教谕等。

台湾建省（1885）以前隶属福建省管辖。康熙年间已有原在闽江流域任职的官员调任台湾地区的事例，雍正七年（1829）以后，闽、台两地互换官员乃成为一种惯例，闽江流域同台湾地区官员互调的事例也就更为常见。据《清实录》，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吏部议复：‘台湾各缺，向例三年任满，称职者加升衔再留三年，方准升用。该员家属，格于成例，不得带往，难免系念。今奉旨：调往各官到任一年，令督抚于内地拣选贤员到台协办，半年后即令旧员回到内地补用。海疆既得谙练之员，而各官又免瞻顾之虑。永著为例’”。雍正八年十月初七日，奏准“嗣后调台各员，候到任二年，该督抚选员赴台协办，仍照例于半年后调回旧员”。照此，闽、台两地互换官员乃成为一种惯例：督抚于闽省内地拣选贤能之员赴台“协办”和“接任”，半年后令旧员回内地补用。

台湾县历任知县中从闽江流域调任的有李中素（康熙三十四年由闽县知县调任）、卢承德（康熙三十六年由沙县知县调任）、陈瑛（康熙四十一年由古田知县调任）、王仕俊（康熙四十三年由清流知县调任）、俞兆岳（康熙五十三年由大田知县调任）、冷岐晖（雍正八年由建安知县调任）、杨允玺（乾隆七年由浦城知县调任）、鲁鼎梅（乾隆十四年由德化知县调任）、刘辰骏（乾隆四十一年由归化知县调任）、夏瑚（乾隆二十三年由闽县知县调任）王

^①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第54页。书院师、长各职虽非官职，但按《大清会典》规定，“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

右弼（乾隆三十四年由德化知县调任）、郁正（乾隆四十一年由归化知县调任）、程峻（乾隆四十七年由闽清知县调任）等；凤山县历任知县中从闽江流域调任的有：李丕煜（康熙五十六年由南平知县调任）、方邦基（雍正十三年由沙县知县调任）、吕钟秀（乾隆九年由将乐知县调任）、王瑛曾（乾隆二十五年由闽清知县调任）、谭垣（乾隆二十九年由政和知县调任）、姚咨义（乾隆三十四年由闽清知县调任）、张升吉（乾隆五十一年由将乐知县调任）、曹谨（道光十七年由闽县知县调任）等；彰化县历任知县中从闽江流域调任的有张与朱（雍正七年由归化知县调任）、秦士望（雍正十二年由政和知县调任）、费应预（乾隆六年由尤溪知县调任）、苏渭生（乾隆十三年由南平知县调任）、朱山（乾隆二十年由建宁知县调任）、成履泰（乾隆三十三年由宁化知县调任）、张可传（乾隆三十六年由闽县知县调任）、焦长发（乾隆四十五年由闽县知县调任）、胡应魁（嘉庆元年由德化知县调任）、李鐸（嘉庆十年由长乐知县调任）、杨桂森（嘉庆十年由南平知县调任）、贾懋功（道光十四年由顺昌知县调任）等；诸罗历任知县中从闽江流域调任的有季麒光（康熙二十三年由闽清知县调任）、董之弼（康熙三十四年由闽清知县调任）、刘宗枢（康熙五十一年由尤溪知县调任）、周钟（康熙五十四年由邵武知县调任）、朱夔（康熙五十八年由南平知县调任）、姚孔（雍正十年由将乐知县调任）、戴大冕（雍正十二年由顺昌知县调任）等。

清代台湾知府从闽江流域调任的有：吴国柱（康熙二十九年由延平知府调任）、周元文（康熙四十六年由延平知府调任）、觉罗四明（乾隆二十二年由福州知府调任）、秦延基（乾隆三十七年由邵武知府调任）、万绵前（乾隆四十三年由延平知府调任）、苏秦（乾隆四十六年由福州知府调任）、孙景燧（乾隆四十九年由延平知府调任）、杨绍裘（乾隆五十二年由福州海防同知升任）、马